

從女性主義出發，試讀江道蓮的短篇小說

何思靈*

江道蓮——戰時的一種女性視角

2013年是江道蓮百年華誕，而就在這一年，短篇小說得到了瑞典皇家科學院的青睞。它將諾貝爾文學獎授予了最傑出的短篇小說家之一——愛麗絲·門羅。以此種方式提高了敘事體裁文學的地位。

讓我們先從一個問題開始。我們能將此位澳門土生女作家視為一個女性主義者嗎？江道蓮的女性主義藏而不露，隱含在她的作品中。¹

其短篇小說所選擇的中心主題為婦女——這是默默無聞或被忽略了半邊天的——幾乎所有的篇章都是對婦女屈從地位的控訴。有意思的是，這樣的控訴總是籠罩在一片巨大的溫情脈脈之中，猶如在女作家和受苦受難的女主人公之間有著某種聯繫。在她的故事中，女主人以淒慘和被羞辱的形象出現。

《長衫》的敘事空間

在這本包括27篇的短篇小說故事中，大部分劇情發生在中國大陸，但也有些故事，按照人類學家和民族學家馬克·奧格²的講法，通過

* 科英布拉大學文學院歷史博士、里斯本地理學會亞洲委員會副會長、葡萄牙在東方歷史研究員。

1. 然而，她一生主張女性主義。眾所周知，在江道蓮的時代，她所處的社會環境是給離婚女人打上不名的烙印。江道蓮有數次婚姻史。先是同路易斯·阿爾維斯結為秦晉之好，後離異。1948年，復與安東尼奧·馬里亞·康塞森結婚。她逝世於1957年，就在葡萄牙的佛朗哥書店出版了她的第一本，也是唯一一本《長衫》一年之後。
2. 法國人類學家和民族學家馬克·奧格在他於1995年出版的著作《非地之地》中，創造了“非地之地”一語。

不涉及或無涉及，發生在“非地之地”，譬如對葡萄牙的涉及。在短篇小說《林鳳的苦難》中，年輕的中國女子被來自西洋（即葡萄牙）的“他”勾引後遺棄了（這使我們本能地回憶起了普契尼著名的歌劇《蝴蝶夫人》的故事）。

同樣，澳門也是一塊“非地之地”，因為在一個關於澳門的腳註中，在翻譯Ou Mun（澳門）時是個例外。在這篇短篇小說中，使用了澳門一詞，僅僅在《西洋鬼（西方的魔鬼，意即葡萄牙人）》明確地使用了澳門。澳門，女作家稱其為“應許之地”。

然而，這篇短篇小說很有意義，因為它集合了兩個“非地之地”——澳門和葡萄牙。這是對於那些逃離戰爭，尋找落腳點的人來說，具有象徵意義的元素。代表著官方，害怕禁止難民聚集在公共道路上，而驅散之。然而，這是權威之聲，秩序與權力之令，卻也可以發出悠揚的音調，充滿憐憫，如曾經給那些不幸的人分發“……熱乎乎，香噴噴，夾著可口果醬的麵包吃。”

最後的祈禱“菩薩保佑這些‘西洋鬼’吧。”³可以理解為女作家呼籲人們關注澳門的生活和圍繞它的戰火之間的差異，和/或女作家祈禱澳門繼續保持它的政治地位，享受和平與（相對）平靜。

新世界代表著美國夢，其它碼頭可以前往新世界（在《感情的沖突》中，或是逃避責任。在《林鳳的苦難》中構成了其它敘事空間，但是它們永遠達不到華人世界的力量）。

的確，本書的許多敘事空間均在中國。故事發生在這個看來是塊富庶的地方、世界性大都會、向全世界開放（通過通商口岸的西方存在）、充斥着賭博、妓院和歌舞廳的罪惡淵蔽，尤其在日本入侵後，變成了危險之地。在村落中，有著古老傳統的空間，有稻田、貧窮、迷信、天大的不公，那裡很容易出賣不想要的女兒或將女性禁錮在從屬的地位。

3. 江道蓮：《長衫》，澳門，文化司署、東方葡萄牙學會，1995年，第61頁。

題材

某些題材幾乎貫穿了所有的短篇小說。無處不在的因素是決裂，是日本的侵略。它改變了千百萬人的生活。

戰爭是一種鋪天蓋地的主題。它毀滅了家庭、財富、城市和村莊，令大量的人群尋求庇護。

這在許多短篇小說中顯而易見，尤其是《長衫》、《慘無人道的報復》、《沈莉的戀情》、《那個模特兒》、《新生命的降生》和《瘋女》。

日本人的出現將情節分為兩個時間段：正常的過程，無間斷，展現出各種恐怖、逃亡、貧困、苦難與死亡。

傳統給予了婦女一種位於屈從地位，受壓迫的角色，完全服從父親、丈夫和公婆的絕對權威的儒家原則。這也是江道蓮著作的一個共同主題。

在《懷戀之隅》中，兩位無名的年輕人墮入了愛河：一位是建築師，剛從歐洲來；另一位是美麗的中國姑娘，出生豪門，就讀過歐洲學校，但她未能衝破家庭給她的傳統束縛，只能盡孝。這意味著她要接受家庭為她選擇的丈夫，遠離她的愛人。自然，結尾是悲劇性的。年輕戀人自殺身亡，留下她服從的證詞：“如願以償”。

但是貧窮、疾病、飢餓、寒冷、失護的童年是其短篇小說作品中，反複出現的主題，並展現了一個狄更斯的世界，成群結隊的孤兒、骯髒不堪母親，英國工業革命社會所具有的對別人施捨的依賴。這一切在江道蓮的《那位婦女》中均有所刻劃。

這裡，一個“勇敢的母親”寧願將其作母親的權利出讓給一個富裕的家庭，以防子女餓死。變成了一位聖經的母親。在孩子可能被所羅門判刑一斬為二，準備將他交給假母親。

眾所周知，中國傳統社會歷來輕女。

在《羅利日記中的澳門》⁴中，作者強調說：“華人，一方面是表現出對女兒的巨大冷漠，甚至是厭惡，另一方面，是對得子的驕傲和熱血沸騰。兒子總有一天會成為繼承人，接過父親的財產、家規和傳統。當他們生了一個或幾個男丁，別提多趾高氣揚了，同時想辦法處理那些可憐的女嬰。常用的辦法就是處理她們。道德上或肉體上的消滅：將她們推入賣淫的魔窟，或將她們發送到另外一個世界去……。”

顯然，這種野蠻的習俗，女作家是必然要拋棄的。她巧妙地運用了一位母親的巨大痛苦，來加以揭露。在她丈夫和公婆的奴役下，她背著兩歲的女兒阿囡逃離了家鄉。

這位母親，儘管經常到廟裡去磕頭求子，卻只生有女兒。家裡把她們全賣了。她只有阿囡了，丈夫還是要賣，一是為讓雙親高興，二是為了用這筆錢，“把在附近稻田中做工的那個身軀健壯的姑娘娶過來。那個女人肯定會為他生個兒子，一個可以延續祖先香火的孩子。”

就是這個阿囡，現已經在澳門了，夢想著穿上繡花鞋。這是江道蓮最感人的短篇小說之一。

農曆新年雖不是個主題，卻也是一個題材。女作家利用這個中國傳統節日來描寫喜慶活動中所發生的截然不同的故事。

《阿囡的繡花鞋》的悲劇發生在新年期間。在《慘無人道的報復》中，宣揚了儒家的仁愛原則⁵，一個身體力行的父親遇到了老僕人的貪婪與背叛。他綁架了主人的女兒，索要巨額贖金。

外面，鞭炮在歡快地爆炸，室內，焦慮地等待著交出贖款後，女兒回來的時刻。但是，出現的是一具被絲繩勒死的年輕女屍。

還有許多其它悲慘，至少是悲傷的方面，在這些短篇小說中均有描述。在一篇溫情脈脈的故事裡，諸如邪惡與迷信之類的成份殘忍地

4. 《羅利日記中的澳門》，澳門，卡宗比出版社，2000年4月，第164頁。

5.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論語》，第12頁第2行，第15頁第23行，王賓：“‘上帝’與‘天’”，《文化雜誌》，（第二系列）第21期，1994年10-12月，文化司署，第101頁。

描寫到了女人，敘述了她沒有，但應該有的人格，在另一半天邊上應該有的地位。

女作家只要一有機會，總會頌揚中國女子的美麗和表面的——脆弱性，證明她們是善良和勇敢的化身。她們的形象令人回味起童話中的“灰姑娘”的傳統。例如在包含了一切經典成份的《王梅的婚事》中：一位喪母的漂亮女子，惡毒的繼母及貌醜但喜歡治人的繼姐妹，只是缺少豎琴與白馬王子。在這個短篇小說中，結尾是悲劇式的，充滿了神秘色彩，採用了經典的結局出人意料的寫法。

倒數第二個短篇小說《東方的宿命》十分細膩，值得一提。在多篇短篇小說中，女作家描寫了日本的侵略中華民族造成的摧殘，但她並未忘記穿插講述一個日本故事。

日本女孩算身著和服，邁著碎步。儘管害怕丈夫的淫威，還是面對了他，要求他拿出一點錢請老巫醫。她的小兒子燒得厲害，需要照顧。

接受治療後，孩子的病有了好轉，但喝得醉醺醺的父親，一身酒氣，竟然把躺在他身邊的兒子熏死了。

萬念俱灰的算回憶起自己在廣島父母莊園裡度過的童年。那是幸福的時光，直到發生了原子彈的悲劇，她被奪去了家人和財產，只有她僥倖活了下來。一無所有的她，像所有的女子，產生了掙脫的勇氣，選擇了在村裡投河自盡。

這篇短篇小說告訴了我們什麼？江道蓮涇渭分明：如果說中國人民遭受了日本的侵略，日本人民同樣也是這場戰爭的受害者。從另一方面而言，對女性的壓迫是她的那個時代一種幾乎普遍的做法。作為一個清醒的記者，江道蓮深知此點。

但並不一切都是黑暗的，也有明媚的時刻，如《未實現的預言》中的梅鳳，《珍珠的新年》中的珍珠。在這兩篇短篇小說中，愛情最終成為了主角。

所有女人勇敢的態度也都是陽光的。她們忍受著生活中的侮辱、虐待和不幸，如同《沈莉的戀情》中的沈莉，如同《那個模特兒》中的達夫妮，重新開始生活。

微妙的女性主義

在她的故事裡，依我們看來，江道蓮故意不涉及與她一樣的土生女子，也不談到來自“宗主國”的葡萄牙婦女，只就在澳門生活的葡萄牙女人提出一些看法。

至於中國婦女，作者實際上涉及了所有中國婦女。她從不妄加指責，達到了想要的結果。畢竟，她譴責了婦女及她們在男人統治下的處境。這便是她的目標。

此處寓含著她的女性主義。如果我們欲如此稱呼之，便可呼其為一種微妙的女性主義。不使用激進或適度挑戰而被視為經典的話語，但一位婦女的智力和態度說明，如其所言，如果男人們“道出心聲”⁶，世界會變得更美好。

6. “新生命的降生”，載《長衫》，澳門，文化司署、東方葡萄牙學會，1995年，第89頁。